

“技术封建主义与文化霸权研究”专栏导语

源起于科技革命的数字技术正在重构着世界各国的经济架构,其影响快速蔓延到政治领域,并广泛地渗透到当代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借助技术封建主义、数字殖民主义、信息帝国主义等新的理论架构,当下一些西方学者力图对资本主义新样态进行理解和阐释。数字革命语境中的世界,强者恒强、弱者愈弱。数字霸权既是一种经济霸权,也是一种政治霸权,同时还是一种规范、扭曲和构建了主体心理和行为的文化霸权。从知识社会到知识垄断,再到知识霸权,一种新型的经济、政治、文化关系已经悄然形成。技术割据、网络逻辑、数字操控等在文化场域中对大众心理施加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和规约。在此情势下,西方学界主要以美国的并辅之以中国的一系列科技巨头(谷歌、苹果、脸书、微软和百度、阿里巴巴、腾讯、华为)作为研究对象,预设了当下数字领域的技术革命主要发生在美国和中国这么一个基本前提。这样的认知架构和阐释策略,实际上已经在相应的研究中,暗中介入了科技巨头们与中国社会文化之间的愈来愈深入和广泛的互动。学术中国化的旨归是从根本上摆脱对西化的学科体系和理论框架的依赖,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知识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昭示社会科学的中国特性、中国格调、中国气质。在此意义上,本专栏中的两篇国外学者的文章和两篇国内学者的论文从不同维度切入对数字技术这一题旨的研究,各有千秋,既彰显了国际视野,也体现了本土特质。其中莫罗佐夫《对技术封建主义理性的批判》批判了西方学界试图以封建主义经济架构为坐标来理解当代数字革命和科技发展的理论尝试,认为没必要用定义尚不清晰的“技术封建主义”来界定当下的资本主义新样态。瑞卡普《资本主义一如往昔?》则指出,要以具体的科技巨头公司为例,在技术封建主义这个题域中进行深入的研究,以期达成更为合理的理解、阐释与预测。赵淳、曾丽瑾《技术封建主义:文化霸权的新向度》认为,技术封建主义的文化逻辑主要在知识垄断和大数据操控两个层面展开,文化霸权以一种全新的样态给主体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和规约。卢凌宇、宋博文《“数字殖民主义”的构成、影响及应对》通过研究数字寡头与西方发达国家对世界人民和发展中国家的各种掠夺,提出我国应更重视研究数字技术的发展,以便应对可能的风险。

四川外国语大学外国语文研究中心 赵淳

对技术封建主义理性的批判^①

叶夫根尼·莫罗佐夫¹/文 蒋林²/译

(1.《新共和》杂志社,美国华盛顿特区;2.四川外国语大学外国语文研究中心,重庆 400031)

收稿日期:2023-12-1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三十个关键词的文化史”(22WZSB013)的阶段性成果

作/译者简介:叶夫根尼·莫罗佐夫(Evgeny Morozov),《新共和》杂志社编辑,博士,科技互联网批评家,《纽约时报》《金融时报》《华尔街日报》特邀专栏作家,主要从事数字人文、技术史、媒体研究、技术与社会研究。

蒋林,四川外国语大学外国语文研究中心教授,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翻译文化史、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

①本文原载《新左翼评论》,因篇幅等原因,译文有删减。Morozov, E. 2022. Critique of Techno-Feudal Reason [J]. *New Left Review*: 133-134+89-126.

引用格式:叶夫根尼·莫罗佐夫/文 蒋林/译. 对技术封建主义理性的批判[J]. 外国语文, 2024(2): 98-120.

摘要:随着硅谷和华尔街的食利者大亨从用户和债务人那里榨取非生产性财富,人们认为数字资本主义正在催生一个“新封建主义”时代的到来。本文反驳了这种观点,通过分析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布伦纳论战,从封建主义逻辑和哈贝马斯的“再封建化”概念入手,剖析了原始积累中剥削、征用、掠夺的资本主义本质,指出与施加在资本家身上的系统性压力所导致的“创新式积累”不同,哈维的“剥夺式积累”已成为新时代积累的主导形式;文章认为现代金融被剥夺逻辑和寄生逻辑所取代,资本家通过对知识产权和无形资产——包括数据持有的控制,成为完全寄生于大众创造力而无需直接参与生产过程的食利者;数据的兴起催生了庞大的数字经济,谷歌、脸书等数字巨头通过用户、数据和广告之间的关联掠夺了全球大量的剩余价值。文章对祖博夫的“监视资本主义”提出了质疑,认为它缺乏激进的政治议程,无法把握非资本主义数字经济在未来的运作方式;文章同时批判了技术封建主义的分析框架将国家排除在外的做法,指出其忽略了美国在硅谷崛起为全球技术经济霸主的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关键词:数字资本主义;新封建主义;数字经济;科技公司

中图分类号:G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414(2024)02-0098-23

首先是好消息,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eric Jameson)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暂停想象资本主义的终结终于结束了。晚期资本主义当然已经够糟糕的了,气候变化、不平等、警察暴行和致命的大流行病等问题层出不穷。但是,在使反乌托邦再次变得伟大之后,一些左翼人士已经开始悄悄修改詹姆逊式的箴言:今天,想象世界末日比想象我们所知道的资本主义的延续更容易。

不太好的消息是,在进行这种世界末日般情景规划的投机活动时,左翼很难将自己与右翼区分开来。事实上,这两种意识形态的两极在对新现实的共同描述上几乎趋于一致。对两个阵营中的许多人来说,无论是民主社会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还是“纯粹的”古典自由主义,实际存在的资本主义的终结不再意味着一个更美好时代的到来。相反,正在形成的共识是,新制度无异于封建主义。新封建主义理论的许多拥护者认为,它的兴起与硅谷的兴起是同步的。因此,像“技术封建主义”“数字封建主义”和“信息封建主义”等术语经常被人提及。“智能封建主义”虽然还没有流行起来,但它可能并不遥远。

在右翼,“回归封建主义”理论最直言不讳的支持者是保守派城市理论家乔尔·科特金(Joel Kotkin),他在《新封建主义的到来》(*The Coming of Neo-Feudalism*, 2020)一书中瞄准了“已觉醒”的技术寡头的权力。科特金选择使用“新的”(neo),而更倾向于新自由主义的年轻思想家格伦·韦尔(Glen Weyl)和埃里克·波斯纳(Eric Posner)在其备受讨论的《激进市场》(*Radical Markets*, 2018)一书中选择使用“技术的(techno)”这一前缀。他们写道:“技术封建主义会阻碍个人发展,就像封建主义阻碍了获得教育或投资改良土地一样。”(Posner et al., 2018:232)当然,对古典自由主义者来说,资本主义被政治腐蚀,总是处于倒退到封建主义的边缘。然而,一些激进右翼人士将新封建主义视为一个值得接受的

项目。

在左翼,那些玩弄“封建主义”概念的人的名单很长,而且还在不断增加:亚尼斯·瓦鲁法基斯(Yanis Varoufakis)、玛丽安娜·马祖卡托(Mariana Mazzucato)、乔迪·迪恩(Jodi Dean)、罗伯特·库特纳(Robert Kuttner)、沃尔夫冈·施特雷克(Wolfgang Streeck)、迈克尔·哈德森(Michael Hudson)和罗伯特·布伦纳(Robert Brenner)等,他们都参加了关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布伦纳论战(Brenner Debate)。值得称赞的是,他们中没有一个人声称资本主义已经彻底灭绝或者我们又回到了中世纪。他们中更谨慎的人,比如布伦纳,认为当前资本主义制度的特征,即长期停滞不前、政治驱动财富向上再分配、精英阶层炫耀性消费以及群众日益贫困,让人想起了其封建前身的某些方面,即使资本主义仍然在很大程度上统治着这个时代。然而,对于所有这些免责声明,许多左翼人士发现,称硅谷或华尔街为“封建”是不可抗拒的,就像许多专家无法抗拒称特朗普或欧尔班为“法西斯分子”一样。尽管与历史上的法西斯主义或封建主义的实际联系若即若离,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份声明足以令人震惊,让昏昏欲睡的公众从自满中清醒过来。另外,这是一个很好的网络迷因^①(meme)。瓦鲁法基斯和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Žižek)在油管(YouTube)上讨论技术封建主义的视频在短短三周内就获得了超过30万的浏览量^②。

对瓦鲁法基斯和马祖卡托这样的知名人物来说,用封建魅力的召唤来吸引他们的受众,可以提供一种媒体友好的方式重复他们以前提出的论点。在瓦鲁法基斯看来,技术封建主义似乎主要是关于量化宽松的反常的宏观经济影响。对马祖卡托来说,“数字封建主义”指的是科技平台产生的不劳而获的收入。谷歌和亚马逊是资本家吗?它们是否像布雷特·克里斯托弗斯的《食利者资本主义》(*Rentier Capitalism*)所认为的那样是食利者(Christophers, 2020)? 优步呢? 它只是一个中介、一个介于司机和乘客之间的出租平台还是生产和销售运输服务? 这些问题对我们如何看待主要由科技公司主导的当代资本主义本身不无影响。

封建主义正在卷土重来的观点也与左翼指责资本主义为榨取主义的批评相一致。如果今天的资本家只是懒惰的食利者,对生产过程毫无贡献,难道他们不应该被降级到封建地主的地位吗? 左翼知识界中媒体友好和网络迷因友好的人士对封建主义意象的拥抱没有停止的迹象。然而归根结底,封建主义言论的流行证明了知识的软弱,而非媒体的精明。这好似如果不调用腐败和堕落的道德语言,左翼的理论框架也就无法再理解资本主义。在

① 译者注:网络迷因指某个理念或信息迅速在互联网用户间传播的现象。

②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数字文化就已经淹没在“圈占”“公地”“强盗大亨”“技术霸主”“数字佃农”,甚至“数字猎巫”等中世纪意象之中,更不用说翁贝托·艾柯(Umberto Eco)将Dos和Mac用户比作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了。因此,技术封建主义的诊断是在肥沃的土壤上进行的。

下文中,我将深入分析一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争论,探讨资本主义与早期经济形式区分开来的显著特征以及那些定义了新数字经济中政治经济运作的特征,希望对技术封建理性的批判能够给我们所处的世界带来新的启示。

1 封建主义逻辑

除了新反动派之外,几乎所有使用这个词的人都认为新封建主义回到了暴虐的过去,应该受到强烈谴责。但它到底有什么问题呢?就像托尔斯泰笔下不幸的家庭一样,那些对新封建主义不满的人各有自己不满的方式。这些差异部分源于“封建主义”一词本身的争议性。它是一种根据其生产力和创新的开放性来评估的经济体系吗?或者是一种根据谁在其中行使权力、如何行使权力以及对谁行使权力来评估的社会政治制度?这并不是一场新的论战,中世纪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都很清楚这一点,但这些定义上的模糊性已经渗透到了关于新封建主义和技术封建主义的初步讨论中。

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封建主义”一词首先指一种生产方式。因此,这个概念定义了一种经济逻辑,通过这种逻辑,作为封建经济的关键,农民生产的剩余被地主占有^①。当然,将封建主义视为一种生产方式并不意味着政治和文化因素无关紧要。并非所有的农民、土地和地主都是相似的;各种多层次的等级制度和错综复杂的区别根植于起源、传统、地位、力量,不仅塑造了阶级之间的互动,也塑造了阶级内部的互动。封建主义自身的可能性条件与继承它的资产阶级政权一样复杂。例如,封建主义制度下主权的特殊性留下了重要的印记,正如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所强调的那样,它被“分割”给了土地所有者,而不是集中在最高阶层。然而,对于所有这些细微差别,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重要分支都专注于破译封建主义的经济逻辑,作为阐明其继承者资本主义政权的关键。

从最简单的角度来说,封建主义的经济逻辑是按以下方式进行的。农民拥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工具和牲畜,获得公共土地,因此他们在生产物质方面从地主那里享有一定的自主权。封建地主没有动力去提高农民的生产率,所以不会过多干预生产过程。农民生产的剩余产品被地主公开征用,最常见的是诉诸传统或法律,由地主通过暴力威胁,而且往往使用暴力来强制执行。对于这种榨取剩余产品的本质不存在任何混淆:农民对他们的自由没有任何幻想。他们在生产物质方面可能有相当大的自主权;然而,他们的自主权总体上受到严格限制。

因此,许多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在封建主义制度下,榨取剩余的手段是超经济的,本质上主要是政治的;货物在暴力威胁下被征用。相反,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榨取剩余的手段完

^① 马克思主义把封建主义解读为一种经济逻辑,可参阅克里斯·威克姆(Wickham, 2021)。

全是经济的:名义上的自由代理人不得不出售他们的劳动力,以便在现金经济中生存,在这种经济中,他们不再拥有维持生计的手段,然而,这种“自愿”劳动合同的高度剥削性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隐形的。因此,当我们从封建主义转向资本主义时,政治上的征用让位于经济上的剥削。超经济和经济之间的区别表明,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一个范畴,只有通过资本主义的视角来审视时才能理解“封建主义”,资本主义通常被认为是比封建主义更进步、更理性、更有利于创新的继承者。其创新之处在于:在只依靠经济手段榨取剩余方面,除非绝对必要,它无需弄脏自己的双手;资本主义制度中“看不见的利维坦”会完成剩下的工作。

相比之下,对于大多数非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来说,封建主义不是一种落后的生产方式,而是一种落后的社会政治制度,其特点是暴力肆虐、人身依附和效忠关系泛滥,通常以最脆弱的宗教和文化理由为其辩护(Block,1939/2014)。这是一个不受约束的私人权力统治至高无上的制度。因此,在这种相当多样化的知识传统中,习惯性地将封建主义与尊重法律和执法的资产阶级国家而非资本主义进行对比。做一个封建臣民,就是在专横的私人权力的恐惧下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对自己没有参与制定的规则战战兢兢,也不可能对自己的有罪判决提起上诉。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作为封建主体的对立面,农民是资本主义企业中完全无产阶级化的工人;对非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农民是现代资产阶级国家的公民,享有大量有保障的民主权利。

无论范式如何,理论上都有可能找出封建制度的主要特征,并研究它们是否可能在今天卷土重来。例如,如果我们将封建主义视为一种经济制度,其中一个特征可能是统治阶级的寄生性存在,他们以其统治的阶级(或多个阶级)的痛苦为代价享受奢华的生活方式。如果我们把封建主义视为一种社会政治制度,它可能将以前属于国家的权力私有化,并通过不透明和不负责任的机构将其分权。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能将封建主义与某种动态联系起来,如果我们能观察到这种动态在我们后封建社会的今天再次出现,即使完全成熟的“新封建主义”还没有出现在地平线上,但我们至少可以谈论社会的“再封建化”。

先驱

大约60年前,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转型》(*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1962)一书中对这一领域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根据他的并非毫无争议的观点,早期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可以在伦敦的咖啡馆里看见,这些咖啡馆是解放话语发展的重要场所。在资本家的规训下,其迫切性与文化产业及其广告综合体的迫切性联系在一起。因此,前现代的私人权力结构和等级制度在哈贝马斯称之为“公共领域的再封建化”中死灰复燃,表明了现代性的曲折动态过程。虽然哈贝马斯最终远离了“再封建化”的概念,更喜欢“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但德国的一些人最近又恢复了这一概念。

在过去的十年里,汉堡社会学家西格哈德·内克尔(Sighard Neckel)产出了大量令人印象深刻的研究成果,记录了新自由主义的推出如何导致前现代社会形式的重新出现,例如工作贫困化、财富分配不均和新寡头的出现。内克尔创造性地融合了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观点,认为我们可能正在见证“没有资产阶级结构的现代资本主义”的出现,而它们的缺席可能是“21世纪资本主义胜利前进的文化先决条件”。因此,新自由主义现代化既不是进步的,也不是倒退的,而是自相矛盾的。对内克尔来说,再封建化并不是回到过去,而是指“当下的一种社会动态,其中现代化采取拒绝资产阶级社会秩序准则的形式”。在这一点上,内克尔与其他著名的德国社会学家沃尔夫冈·克诺布尔(Wolfgang Knöbl)和汉斯·乔亚斯(Hans Joas)对受目的论启发的现代化描述提出了质疑。

在法国法学家阿兰·苏皮奥特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再封建化”一词的有趣用法。在他的《法律人》(*Homo Juridicus*, 2005)和《数字治理》(*Governance by Numbers*, 2015)中,苏皮奥特将新自由主义化和数字化视为“再封建化”的两个主要驱动力(Supiot, 2013: 129-145)。苏皮奥特写道:“封建主义的法律概念为分析在‘全球化’这一非批判性概念下发生的巨大制度动荡提供了极好的工具。”(Supiot, 2015: 225)^①苏皮奥特法律哲学的关键在于区分人治(封建时期的典型,具有个人效忠和依赖关系)和法治(资产阶级国家的成就,它将自己确立为客观的第三方权利保障者和规则的执行者)。因为国家宣布某些领域禁止私人承包,所有公民在工作场所内外能够享有一点尊严,无论他们的权力和财富差距如何。新自由主义使国家服从于效用和效率最大化的必要条件,再次向私人承包敞开了大门。

对苏皮奥特来说,数字化还通过将人们连接到网络来加速“再封建化”过程,在这个网络中,人们的权利和自主权取决于他们相对于其他节点的位置。资产阶级国家的公民原则上有权享有国家的所有权利,无论他们属于哪个群体。但对于网络社会的公民来说,情况是否依然如此呢?他们的网络声誉和数字积分会以他们可能根本意识不到的方式影响着他们与机构的互动。在对新封建主义的大肆炒作中,内克尔和苏皮奥特早期经过仔细论证的批评脱颖而出,尽管这些批评对于今天那些加入新封建主义潮流的人来说仍然知之甚少。当前的争论普遍忽视了他们就新自由主义现代化的矛盾动态所提出的更精细的理论观点。

2 布伦纳还是沃勒斯坦?

但是,在今天丰富的左翼思想中,是什么样的背景知识假设使“新封建主义”这样的概念变得可以思考的呢?毕竟,要提出资本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正在倒退的奇谈怪论,不仅需

^① 这里与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际关系理论中“新中世纪主义”概念的扩散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这一领域,“新中世纪主义”也很早就应用于全球数字经济,参阅斯蒂芬·科布林(Kobrin, 1998)。

要对其动态有非常具体的理解,而且也需要理解真正的“资本主义”的活动和过程,以及那些不是资本主义的活动和过程。那么这些假设是什么呢?

在这里,我们可以从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回到上述关于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性质的争论。人们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完全是由其内部竞争和剥削的动力驱动的,而政治剥夺则牢牢地置于其边界之外。根据这种解读,资本积累完全是由榨取剩余的“干净的”经济手段驱动的。外部的、使征用成为可能的过程,即暴力、种族主义、剥夺、碳化的存在并没有被否认,但它们应该被归类为非资本主义的额外因素;这些因素可能怂恿特定的资本家通过个人努力去占有剩余价值,但它们置身于资本主义积累过程本身之外。那里不存在可以从中推导出来的资本的“运动规律”。这种观点认为,即使“‘政治’领域的强制力最终需要维护私有财产和占有权力,‘经济’需求提供了强迫工人将剩余劳动转移给资本家的直接动力”(Wood,1981:80)。

这里有分析上更混乱、但直觉上更令人信服的另一种选择,即承认如果没有所有这些外部过程,资本主义是不可想象的。这至少是我们知道的历史资本主义,而不是抽象模型的纯粹资本主义。为了理解种族主义或父权制是如何帮助创造其可能性的条件,人们不必否认剥削在资本主义制度中的中心地位。如果没有从全球南方有条不紊地掠夺廉价资源,全球北方的资本主义制度会像现在这样发展吗?与劳动剥削的情况不同,这些历史动态以及其中存在的权衡不能简化为一个简单的公式。

在关于资本主义起源和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性质的具有里程碑意义和范式意义的两次论战中,这些方法之间的差异浮出水面。先是20世纪50年代的多布—斯威齐论战(Dobb-Sweezy Debate),然后是1974年至1982年的布伦纳论战,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和非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以不同的组合彼此对抗,他们就迅速扩张的世界贸易体系与阶级和财产关系变化之间的相对重要性进行了辩论,认为这是导致资本主义(最初在英国)出现的主要因素。这些讨论中出现了许多引人入胜的切入点,其中一个切入点对破译更严谨地表述技术封建主义观点的理论基础至关重要,即“原始积累”对于资本主义起源及其后续发展的核心作用。

在包括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在内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的论述中,“原始积累”指的是在“不平等交换”的标签下,利用超经济的政治手段获取和转移剩余,从较贫穷的地区转移到较富裕的地区,或者如沃勒斯坦所说,从边缘地区转移到核心地区(Wallerstein,1974:16-20)。如果不考虑核心地区对占有整个全球经济剩余的这种能力,我们就无法理解资本主义的起源。这解释了为什么资本主义会在那里出现并繁荣起来。对(从未完全无产阶级化的)雇佣劳动的剥削固然增加了核心地区资本家的财富,但这只是故事的一部分。因此,只关注剥削,忽视今天仍然存在的“不平等交换”和“原始积累”的核心—边缘动态这一事实,

就是对资本主义本质的误解。

布伦纳指责沃勒斯坦的分析是技术决定论,淡化了阶级关系和“相对剩余劳动”的作用,即不断提高的生产力是资本主义的系统性特征。布伦纳认为,沃勒斯坦基于交换的论述是新史密马克思主义(neo-Smithian Marxism)的主要内容,忽视了马克思所说的“原始积累”概念的真正含义。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原始积累应被理解为“使生产者脱离生产资料”的过程,它为雇佣劳动和剥削打开了大门,并逐渐取代了对半自治农民的现成商品的征用。这种脱离是重组阶级关系和财产权转移的结果,与不平等交换或世界贸易关系不大(Brenner, 1977)。正如布伦纳在后来的一篇文章中所说,所谓的“原始积累”阶段不过是形成了“构成资本的社会财产关系”。这当然包括大量的武力和暴力。但原始积累的作用非常有限;它的动态不会与非原始的资本主义积累本身的动态相混淆。

那么这个有限的作用是什么呢?布伦纳认为,“原始积累”仅仅是为了打破封建制度中土地、劳动和技术在政治上形成的“合并”,这种合并阻碍了这三个基本生产要素被更多地用于生产;一旦它们被纳入资本主义的盈利逻辑,这种合并就会得到纠正(Brenner, 2006:79-105)。坦率地说,布伦纳关于封建主义的分析认为,封建主义鼓励人人懒惰。在没有市场竞争压力的情况下,无需担心生产过程的合理化问题。原始积累终结了这种懒惰的乌托邦,带来了资本主义特有的由竞争驱动的“改善意愿”。

然而,粗略地翻阅《资本论》第一卷,就会发现它在原始积累这个问题上比布伦纳最初的论说更模棱两可。在第26章,马克思批评了亚当·斯密相当幼稚的“预先积累”概念,这无疑支持了布伦纳的说法。但是,在第31章,马克思(Max, 1990:915)又说了一些与沃勒斯坦本人的分析思路更为一致的话:

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这些田园诗式的过程是原始积累的主要因素。^①

这一章毫无疑问地揭示了以强制转移为名发动的暴力与资本主义起源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马克思在这里说得再清楚不过了:“欧洲的隐蔽的雇佣工人奴隶制,需要以新大陆的赤裸裸的奴隶制作为基础。”^②这些“征服和掠夺”的暴力实践是否于原始积累阶段停止?它们以剥削为基础,是否跟资本主义积累一样会延续下去?即使“原始积累”本身已成为过去,是否仍有一个与剥削并存的征用或剥夺的持续过程?马克思在讨论这些问题时也有类似的模棱两可。马克思主义中一些模糊的领域,为当前的许多论战提供了素材。

①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200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860-861. (译者注:原文中凡引自马克思原话的地方,译者遵照中央编译局的做法,在翻译时直接参考国内权威中译本的译文,并标明其出处。)

②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200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870.

对布伦纳以及后来围绕他和艾伦·梅克辛斯·伍德形成的政治马克思主义学派来说,这种模糊性并不存在。资本主义之所以以如此迅猛的速度出现和扩张,是因为一系列历史进程以这样一种方式汇聚在一起,迫使资本家进行“创新式积累”。因此,理解资本主义逻辑的布伦纳式项目就变成了阐明“再生产规则”和“运动规律”等术语所形成的动态,通过这些动态,施加在资本家身上的系统性压力导致了创新式积累。这是一个简练而连贯的模式,它假定生产力的提高是创新的结果,而创新又是资本家参与市场竞争、雇用自由雇佣劳动并想方设法降低成本的结果。在这一模式中,没有必要讨论暴力、征用或剥夺;虽然不否认它们的存在,但它们对生产力的提高没有什么贡献,也不是资本主义积累过程的一部分。

3 “剥夺式积累”?

并非所有人都信服布伦纳的论点。在过去的十年里有许多有趣的尝试,提出了剥削和征用过去是、现在仍然是相辅相成的观点。其中有两个观点尤为突出:德国社会学家克劳斯·多雷(Klaus Dörre)在借鉴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土地征用》(*Landnahme*)的基础上理论化了资本主义的“土地掠夺”;南希·弗雷泽(Nancy Fraser)则就剥削与征用之间根深蒂固的结构性联系进行了相关研究,后者为前者的存在创造可能性条件。今天,左翼展开的许多方法论上的讨论——关于叙述资本主义与气候、种族或殖民主义关系的最佳方式,仍然反映了布伦纳—沃勒斯坦论战中尚未解决的问题。

近期的许多研究都建立在大卫·哈维(David Harvey)2003年出版的《新帝国主义》(*The New Imperialism*)一书中所提出的“剥夺式积累”这一颇具影响力的概念之上。哈维创造了这个词,因为他不满意“原始的”这个限定词;和他之前的许多人一样,他认为积累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哈维在《新帝国主义》中总结了关于这个问题的一些最新学术研究,他指出:“简而言之,原始积累需要对已有的文化和社会成就进行征用和吸纳,以及对抗和取代。”这很难说是布伦纳式的“原始积累”,将其描述为打破生产要素之间封建主义“合并”的过程;布伦纳眼中的资本家并没有“吸纳”任何东西,他们在某些系统性的助力下,摆脱了非生产性的社会实践和关系。

遗憾的是,哈维关于“剥夺式积累”的论述虽然承诺了很多,但收效甚微:最终,它比马克思关于“原始积累”的论述更加模棱两可。如果哈维最初的表述是可信的,那么21世纪初那些贫穷的资本家们如果不剥夺别人的东西,就几乎赚不到钱;庞氏骗局、安然公司的倒闭、养老基金的掠夺、生物剽窃的兴起、自然的商品化、国有资产的私有化、福利国家的破坏、音乐产业对创造力的剥削,这些只是《新帝国主义》用来说明这一概念的部分例子。发现这种现象随处可见,哈维毫不意外地得出结论:“剥夺式积累”已成为新时代积累的“主导”形式。

2006年,布伦纳就《新帝国主义》写了一篇褒贬不一的评论,反驳哈维“对剥夺式积累所做的过于宽泛(而且适得其反)的定义”,将这一概念夸大到不再有用的程度(Brenner, 2006)。他发现哈维关于剥夺对资本主义积累起支配性作用的结论“令人费解”。但真的如此吗?如果假设我们仍然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这一结论确实“令人费解”,至少对2006年的布伦纳来说,这似乎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如果资本主义真的结束了,而另一种类似封建主义的制度正向我们走来,那么这种说法就更有意义。

在后来的著作中,哈维又把问题复杂化了,他使“剥夺式积累”成为新自由主义的主要驱动力,将其定义为一个政治项目,在观点上是再分配性的,而不是生成性的,目的是把财富和收入从其他人转移到上层阶级,或从贫穷国家转移到国外的富裕国家。在这里,布伦纳将“剥夺式积累”解释为旨在为创新创造条件,这种善意解释根本没有生存的空间。哈维在沃勒斯坦最初描述的机制中,增加了许多其他剩余转移机制,如围绕知识产权的租金提取。任何深谙正统布伦纳主义“原始积累”观点的人都会立即对哈维的基本事件时序提出异议;即使对沃勒斯坦及其追随者来说,以贸易为基础的原始积累也是先于并伴随着资本主义积累的,它没有取代或超越资本主义积累^①。

自哈维在2000年初首次提出这一概念以来,“剥夺式积累”已被许多学者接受,尤其是那些全球南方国家的学者,他们用这一概念理论化新形式的食利者榨取主义,即企业利用其政治力量来获取土地和矿产资源(Gago et al., 2017:574-591)。所有这些都有一定的逻辑:首先通过超经济的手段剥夺,然后利用产权(包括知识产权)实现食利化,将业务重新转移到经济领域。然而,进入经济领域并不能保证我们处于常态的资本主义。除了矿业和农业需要组织一些生产活动或至少是采掘活动外,资产阶级似乎只是在收获租金,享受奢侈的生活,就像封建时代的地主一样。哈维在2014年写道:“如果每个人都试图靠租金生活,没有人投资产品制造,那么很明显,资本主义正在走向危机。”(Harvey, 2014)但会是什么样的危机呢?哈维本人并没有调侃新封建主义的意象,但他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分析使我们很容易得出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这只是名义上的资本主义,其实际的经济逻辑更接近于封建主义。早在2003年,哈维就声称再分配性的剥夺已经取代了创造性的剥削,我们还能从中得到其他什么样的教训呢?

认知大众

在那些意大利和法国理论家的著作中可以找到类似的观点,他们预言了“认知资本主义”的出现,这是另一种名义上的资本主义。受托尼·内格里(Toni Negri)和其他意大利歌剧家作品的启发,卡洛·韦尔切罗内(Carlo Vercellone)和扬·穆利尔-布唐(Yann Moulier-

^① 在过去十年里,巴西社会学家丹尼尔·宾(Daniel Bin)对剥夺将导致资本主义积累的具体条件进行了更细致的阐述——无产阶级化、商品化和宾所谓的“资本化”的结合——以区别于剥夺仅产生再分配效应的情况。参阅丹尼尔·宾(Bin, 2018/2019)。

Boutang)等著名思想家坚持认为,作为工人阶级后继者的大众,在最新信息技术的武装下,最终能够自主生存。因此,资本不能也不想控制生产,而现在的生产大多以高度知识化的方式发生在泰勒主义工厂的大门外,而这种工厂本身已不复存在(至少在意大利和法国是这样)。今天的资本家们只是建立了对知识产权的控制,同时试图限制不守规矩的大众利用其新获得的传播自由所能做的事情。这些资本家已不再是福特时代痴迷于创新的资本家,而是完全寄生于大众创造力的懒惰的食利者。从这些前提出发,我们很容易想到,某种技术封建主义已经来临:如果芸芸众生真的在做所有的工作,甚至在使用他们自己的生产资料,即计算机和开源软件,那么谈论资本主义似乎就是一个残酷的笑话。

“认知资本主义”观点的一个方面与当代关于当今数字经济的逻辑,即封建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争论有着特别的关系。韦尔切罗内和他的同事们借鉴了意大利工人主义传统,提出了管理阶级过时的假设,认为他们会被大众的创造力打败。在福特主义时期,工厂主或许还能发挥作用,但现代认知型工人不再需要他们。这被认为是一个迹象,表明从形式从属转移到了实际从属,即从仅仅将劳动纳入资本主义关系到根据资本主义需要对其进行结构性改造,现在已经发生了逆转,资本主义正在倒退。尽管这些理论家希望共产主义会首先到来,但封建主义开始显现。

正如乔治·卡芬齐斯(Caffentzis,2012)在一篇富有洞察力的评论中所指出的那样,管理人员可能与生产过程的组织无关,这本身并不能证明资本主义企业的收入是以租金而不是利润的形式入账的。毕竟,有很多资本主义企业几乎是完全自动化的,既没有管理人员,也没有工人。因此,它们应该被视为食利者吗?认知资本主义理论家的回答似乎是肯定的:这类公司必须寄生于某种东西之上,可能会压榨专利组合、房地产控股或人类的总体智力。以自动洗车为例,仅仅因为它不雇用任何人,因而产生不了剩余价值,还是因为为了实现自动洗车,使用了一些算法——这些算法无疑使用了前人的劳动和凝结的知识,甚至可能还使用了一两项专利,我们就有理由认为它不是资本主义企业吗?

也许不是。根据马克思自己关于不同自动化企业和行业的利润均衡化的著作,洗车只是吸收了经济中其他地方产生的剩余价值。把这些自动化企业描述成“食利者”而非真正的资本家,就等于去除了马克思论述资本主义竞争的实质;恰恰是自动化的持续驱动,即削减成本和提高利润率解释了资本不断流向生产率更高的企业的原因。工人主义是认知资本主义理论的思想基石,仍然受困于人类工人的认识论:如果没有工人,意大利理论家们就会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并没有发生,食利主义统治着这个时代。

4 数字财富

技术封建主义理论家分享了对于认知资本主义的假设,认为信息和数据网络的本质将

数字经济推向租金和剥夺的封建主义逻辑,而不是推向利润和剥削的资本主义逻辑。它究竟是什么?一个显而易见的解释指向知识产权的巨大增长及其所建立的特殊权力关系。早在1995年,澳大利亚法律学者彼得·德霍斯(Peter Drahos)就对迫在眉睫的“信息封建主义”发出了警告。在文章的前半部分,德霍斯想象了2015年的世界(他几乎都说对了);在文章的后半部分,他认为将专利权扩展到算法等抽象对象将导致个人专断权力的扩散(Drahos, 1995; Drahos et al., 2002)。同样地,苏皮奥特关于封建化的批判宣称,知识产权允许将物品的所有权与控制权正式分离。这是对过去的复古。

数字经济的另一个特点似乎与封建模式,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生产模式的多样化相一致,那就是使用数字服务的用户被迫以一种奇怪的、近乎偷偷摸摸的方式交出他们的数据。我们都知道,使用数字产品会产生数据痕迹,其中一些数据痕迹会被汇总。这些数据痕迹所产生的潜在洞察力有助于完善现有服务、微调机器学习模型和训练人工智能,也可以被用来分析和预测我们的行为,为行为广告的在线市场推波助澜。人类是激活涵盖这些数字对象进行数据收集过程的关键。如果没有我们人类,许多初始数据痕迹将永远不会产生。

就资本主义而言,到底发生了什么?与认知资本主义理论家一样,我们可能会认为,用户实际上是工人,技术平台依靠我们的“免费数字劳动”生活;如果没有我们与所有这些数字对象的互动,就不会有太多的数字广告出售,而人工智能产品的制造将变得更加昂贵。另一种观点——肖莎娜·祖博夫(Shoshana Zuboff)是其代表——将用户的生活比作遥远的非资本主义国家的原始土地,它们受到数字巨头采掘活动的威胁。正如她在《监视资本主义时代》(*The Age of Surveillance Capitalism*, 2018)一书中所说,我们注定要被“数字剥夺”“我们是原住民,我们对自决的默认声明已经从我们自身经验的地图上消失了”(Zuboff, 2019)。

祖博夫与“数字劳动”理论保持了距离,事实上,她跟对劳动的简单思考保持距离。因此,她对剥削并无太多的论述;在监视资本家这方面似乎做的也不多。相反,她借鉴了哈维的“剥夺式积累”,将其视为一个持续的过程。祖博夫详细讨论了谷歌提取和征用用户数据的复杂程序。“剥夺”一词在书中出现了近百次,最初通常与其他术语进行组合,如“剥夺循环”“行为剥夺”“人类经验的剥夺”“剥夺产业”和“单方剩余剥夺”。尽管《监视资本主义时代》高调地将用户描述为“原住民”,但毫无疑问,“剥夺”是通过现代技术和工业规模实现的,这让它看起来像资本主义。

阅读祖博夫对推动由谷歌驱动的数字经济的象征性和情感性暴力、欺骗和征用的生动描述,人们可能会问,为什么她将它称为“监视资本主义”,而不是“监视封建主义”?在该书的第一页,她就提到了“一种寄生性经济逻辑”,这与列宁对食利者利润支撑“帝国主义的寄生性”的著名分析相去不远。祖博夫在《监视资本主义时代》一书中的好几个地方粗

略涉及到了“封建主义”这种表达,但她并未完全接受它。然而,细究起来,她所描述的经济体系既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封建主义。由于找不到更好的词,我们或许称之为用户主义(userism),直接类比于意大利的工人主义(workerism)。意大利人无法想象,非食利、轻劳动的资本主义企业如何仅仅通过吸引其他地方生产的剩余价值来赚取资本主义利润;因此,他们最终引入了诸如“免费数字劳动”之类的僵化概念。反过来,祖博夫也无法想象,凝结在用户接触数字产品时从用户那里攫取的数据中的人类经验,并不是谷歌暴利背后的主要驱动力。

用户主义认为,从谷歌到脸书,这些公司的大部分利润都来自对用户数据的征用。但真的是这样吗?还有其他解释吗?祖博夫只列举了能够证实她现有论点的证据:用户把数据给了谷歌;谷歌利用这些数据进行个性化广告和构建数据密集型云服务(这是谷歌业务的一个重要部分,祖博夫对此很少提及)。因此,一定是用户、数据和广告之间的联系为谷歌带来了暴利。

作为公司的谷歌

为了更清晰地了解谷歌的商业模式,我们将它与瑞典的流媒体音乐服务平台“声田”(Spotify)进行比较。两者的模式有些相似:虽然声田的付费用户占其收入的大部分,但它也有大量的非付费用户。非付费用户可以免费收听音乐,但每听几首歌就有一次广告。尽管声田近期股价表现抢眼,但并不盈利:2020年,它亏损了8.1亿美元。相比之下,谷歌母公司“字母表”(Alphabet)2020年的盈利为41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来自谷歌的广告业务。事实上,声田自成立以来一直在亏损:从2006年到2018年(可获得此类总数据的最后一年),声田在授权交易上花费了100亿美元,向音乐厂牌和艺人支付费用,以获得流媒体播放其音乐目录的权利。

现在,声田开展的是什么业务呢?有人可能会说,它销售的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商品:一种独特的、个性化的用户体验,提供可以实时访问几乎无限的音乐收藏。声田向非付费用户赠送了其中一些商品,但它这样做是因为它找到了一种聪明的方法,将另一种基于广告的商品出售给其他人;没有前者,后者是不可能实现的。声田通过观察用户的收听习惯,每周都会为他们制定个性化的播放列表,这其中有大量的数据提取工作,而且我们不应忽视知识产权对其商业模式的重要性。但是,声田的商业模式是否应该因此被解释为只关注数据提取,而忽略了它从事资本主义生产活动这一事实呢?如果是这样,就会忽略所有数据只是声田主营业务的附加部分,即其独特的音乐和品牌体验商品。在这种模式中,被鄙视的食利者是音乐厂牌;声田和亨利·福特一样,都是持牌的资本家。

让我们回到谷歌。它也生产一种商品,即实时获取大量人类知识,但与声田不同的是,谷歌的商品生产成本要低得多。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谷歌并不向发布者和内容创作者

支付报酬,至少不像声田向音乐厂牌支付报酬,谷歌是通过索引发布者和内容创作者的网页来生产商品的。与声田不同的是,谷歌不向付费用户提供不同的、无广告搜索体验;但它的姊妹网站油管是按月收费的。就像声田对非付费用户一样,谷歌免费提供搜索商品,这反过来又使它有可能向广告商出售另一种高利润商品,即访问用户屏幕和吸引关注。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大量的个人数据被偷偷提取出来,使广告商品变得更有价值。但是,如果谷歌真的要为它在搜索结果里的第一页显示的每一条索引的内容支付一笔费用,那么这一切都将不重要了,因为紧挨着这些内容的广告让谷歌赚得盆满钵满。

《监视资本主义时代》长达 704 页,但祖博夫在讨论其他主题的不同段落中,只有两句话提及谷歌商业模式的核心原罪。她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她简略地写道:“谷歌的网络爬虫已经从他人那里无偿获取了索引信息。”不难看出,这并不符合祖博夫自己对“剥夺”的定义,即没有相关的用户。因此,谷歌的实际资本主义运作与用户主义无关。然而,在这里只关注用户及其数据,就好比只关注声田的个性化播放列表而忽略版权支付一样:前者并非完全无关紧要,它们让用户流连忘返,但就整体而言,与后者相比,前者的解释力显得微不足道。

自相矛盾的是,谷歌商业模式的巨大成功表明,它所处的环境不是由“信息封建主义”而是由“信息共产主义”定义的。正因如此,谷歌“组织世界上所有知识”这一近乎社会主义的崇高目标才能为其无限且无偿地索引他人生产的信息提供正当理由,就好像产权(包括与获取和使用相关的权利)并不存在一样。祖博夫关于“监视资本主义”论述存在的问题是,它本质上无法把握非资本主义数字经济在未来的运作方式。因此,除了对“未来权利”等无法定义的东西提出一些模糊的自由主义要求外,监视资本主义没有激进的政治议程。

5 还是资本主义吗?

直到最近,大多数左翼关于新封建主义和技术封建主义的正式文献都将其视为一种社会政治制度,而不是一种经济制度,就像内克尔和苏皮奥特一样。法国经济学家塞德里克·杜兰德出版了《技术封建主义》(*Techno-féodalisme*),这是迄今为止对相关经济逻辑进行认真思考且最持久的尝试(Durand, 2020)。杜兰德凭借《虚构资本》(*Fictitious Capital*, 2014)一举成名,该书对现代金融进行了深入分析。与一些左翼人士的假设相反,杜兰德认为,金融活动并不一定是“掠夺性的”:在一个运作良好的体系中,金融活动可以通过促进提前融资等方式助推资本主义生产。然而,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现代金融这种有利于积累的特征被两种更邪恶的动力所取代。第一种动力植根于哈维理论中的剥夺逻辑,涉及强大的金融机构利用它们与国家的关系,将更多的公共资金转向自身;在华尔街和华盛顿

之间密切联系的支持下,我们又回到了“超经济”价值榨取手段,或者更准确地说,回到了价值再分配手段。第二种动力源于列宁在分析帝国主义时提出的寄生逻辑,指的是非金融公司必须向金融公司支付的各种款项如利息、股息、管理费,而金融公司则完全游离于生产过程之外。

杜兰德认为,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救助措施加剧了剥夺和寄生的动力,同时抑制了创新的动力。在《虚构资本》的最后几页,他问道:“这还是资本主义吗?”这个制度的垂死挣扎已被预言过上千次了。但现在它很可能已经开始。因此,金融家致力于政治组织的向上再分配和由租金支持的寄生主义,便可以加速向后资本主义制度过渡的想法不仅非常吸引人,而且在理论上也是可信的。

杜兰德在新书《技术封建主义》中继续关注资本主义迫在眉睫的终结,但将埋葬资本主义的任务交给了科技公司。《虚构资本》已经研究了所谓的利润投资之谜:当资本主义运作良好时,更高的利润应该意味着更高的投资;做资本家的全部意义就是永远不要停滞不前。然而,大约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这种联系就不复存在了: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的利润在波动中上升,但投资却停滞或下降。对此,人们提出了许多解释,包括股东价值最大化、垄断加剧或不断加速的金融化的毒害效应。杜兰德没有提出新的因果关系。相反,他转而认为,“没有积累的利润之谜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人为的”。

一方面,一些企业找到了不需要额外投资就能赚到更多钱的方法。全球化和数字化使全球北方的顶级公司,例如沃尔玛能够利用其在全球商品链顶端的位置,以较低的价格从商品链下游的参与者那里获得最终产品或中间产品。另一方面,当全球北方的资本家进行投资时,这些投资越来越多地流向了全球南方。因此,通过全球北方个别国家(例如美国)的视角来观察利润投资动态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人们需要从全球视角来观察利润如何准确地映射到投资中。

凭借《技术封建主义》,杜兰德拥有越来越多的志同道合者,他们通过强调知识产权和无形资产(包括数据持有)的作用来解释利润投资之谜,使美国巨头公司专注于那些最高利润部分,从供应链中榨取巨额利润(Orhangazi, 2019; 1251-1286; Schwartz, 2021: 1-26)。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对杜兰德2014年论点的一种阐述,但更多地关注了全球供应链的实际运作,以及知识产权在其中的权力分配中所扮演的角色。对于他所研究的一些企业来说,没有投资的利润之谜不再是人为的,就像《虚构资本》一书所说的那样: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无论利润水平如何,这些企业确实没有进行多少投资。它们要么将盈利以股息的形式返还给股东,要么回购自己的股票;有些公司,如苹果公司则两者兼而有之。

《技术封建主义》认为,无形资产通常集中在全球价值链中利润最高的环节,无形资产的兴起导致了四种新型租金的出现。其中法律知识产权租金和自然垄断租金看起来有些

相似:第一种指的是来自专利、版权和商标的租金;第二种指的是类似沃尔玛的公司整合整个价值链并提供其中所需基础设施的能力所产生的租金。另外两种租金即动态创新租金和无形资产级差租金听起来更为复杂,但它们也捕捉到了相对清晰和独特的现象:前者指属于公司专有财产的有价值的数据集;后者指单一价值链内公司扩大经营规模的能力(主要拥有无形资产的公司可以更快、更便宜地做到这一点)。

杜兰德的分类法很简练。有了这些分类,他开始发现食利者无处不在,而资本家却杳无踪迹。他总结道:“数字的崛起催生了一个巨大的租金经济”,因为“对信息和知识的控制,即知识垄断,已经成为获取价值的最有力手段”。杜兰德对麦肯齐·沃克(McKenzie Wark)最近关于这一主题的推测表示赞同,并回到了他在2014年提出的问题:这还是资本主义吗?为了提高生产力、削减成本和增加利润以确保资本主义制度的活力,就必须进行投资。这种必要性是由于资本家在市场竞争压力下进行的运作以及商品、劳动和技术的可替代性。正如布伦纳所说,这是打破封建主义下这三个要素“合并”的结果。

无形资产的兴起,尤其是数据的兴起,逆转了资本主义对这种合并的破坏。杜兰德认为,如果数字资产与生产它们的用户及平台不可分割,那么我们就可以把数字经济解读为再次“合并”了主要生产要素,从而阻碍了它们的流动性。简单地说,我们被困在科技公司的围墙花园里,我们的数据被精心提取、编目和货币化,使我们永远与它们绑定在一起。这削弱了市场竞争的生产力诱导效应,让那些控制无形资产的人拥有令人印象深刻的能力,他们无需参与生产就能占有价值。杜兰德写道:“在这种结构中,投资不再是以生产力的发展为导向,而是以掠夺性力量为导向。”^①

寄生和剥夺可能不再是杜兰德《技术封建主义》书中词汇的一部分,它们被“掠夺”所取代,金融业让位于技术产业,但其逻辑与《虚构资本》并无太大不同。数字经济之所以具有新封建主义和技术封建主义的色彩,是因为尽管工人们仍然受到旧资本主义方式的剥削,但受益最大的却是拥有复杂掠夺手段的新数字巨头。与封建主类似,它们设法攫取了全球大量的剩余价值,却从未直接参与劳动剥削或生产过程。杜兰德借鉴了祖博夫的研究成果,展示了大数据中“大他者”(Big Other)所发挥的隐性支配作用,她认为,谷歌成功的秘诀在于它从各种数据集中提取、组合和获利的能力。由于网络效应和令人印象深刻的规模经济,谷歌享有有效的垄断地位:它将从任何新数据集中获得比初创公司更多的利益,从而使竞争变得更加困难。

^① 阿根廷经济学家塞西莉亚·里卡普曾是杜兰德的合著者,她在最近出版的一本关于她所说的“知识垄断资本主义”的书中,也借鉴了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的观点,对掠夺提出了类似的论点。参阅塞茨莉亚·里卡普(Rikap, 2021)。在追踪全球经济中的封建主义倾向方面,她没有追随杜兰德的脚步,而是选择了沃勒斯坦式的论述,将主要科技公司视为资本家,他们通过剥削和征用,汲取任何他们能找到的剩余价值。

但是,与祖博夫一样,杜兰特忽视了索引在谷歌整体业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因此论证的总基调过于偏向用户主义。在这里,很难援引“知识垄断”这样的概念,因为谷歌为提供搜索结果而链接到的第三方页面仍然是其发布者的财产;谷歌并不拥有索引的结果。理论上,任何其他资本雄厚的公司都可以建立索引这些结果的网络爬取技术。这可能会非常昂贵,但我们不应该把这种障碍与类似于租金的情况混为一谈:对柏林的一家初创公司来说昂贵的东西,对有1,000亿美元愿景基金的日本软银公司而言可能十分便宜。谷歌拥有的大量数据是另一回事;它们确实值得用来讨论租金问题。但我们不能假设谷歌的业务就是这些数据,就好像谷歌仅仅是一个食利者,而不是一个标准的资本主义公司。

6 掠夺性力量?

杜兰德的推理还借鉴了经济学家邓肯·弗利(Duncan Foley)关于全球经济中信息租金的重要研究成果。与马克思的观点一致,弗利认为,剩余价值不仅是在它产生的地方被占有。用马克思和一些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看待土地食利者的方式来看待通过知识产权获得的大量无形资产,我们发现,庞大的信息技术平台并不是资本家,而是伪装的食利者。弗利写道:

强制性的产权允许生产资源(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术语中通常称为“土地”)的所有者排除资本家获取这些资源,从而产生了‘租金’。这些租金是资本主义生产中产生的剩余价值池的一部分,尽管它们本身与剥削生产劳动没有直接关系。土地资源(如肥沃的田地、瀑布、矿产和碳氢化合物储量等)的所有者无需动一根手指或雇用他人动一根手指进行生产,就能分享生产性雇佣劳动产生的剩余价值。(Foley, 2013)

这里的类比非常清晰:土地=数据;科技公司=非资本家;他们的收入=租金。弗利以瀑布为例,认为“一旦某个特定的个人或实体确立了如对瀑布的产权控制,构成全球剩余价值池份额的租金就会产生”。但他进一步指出,还有比拥有瀑布更好的东西。毕竟,水是稀缺的。另一方面,无形资产可以是无限的:如果一个人拥有一首流行歌曲的版权,他就可以从中获得几乎无限的租金。

现在,一个突出的重要问题是,谷歌及其同行是否就像瀑布的非资本主义所有者一样,“无需动一根手指”就能分享其他地方产生的剩余价值?弗利的回答是肯定的。但是,如果科技巨头们真的是懒惰的食利者,利用知识产权和网络效应来剥削每一个人,他们为什么要在只能被描述为某种生产上投入那么多钱呢?什么样的食利者会这样做?2017、2018、2019和2020年谷歌母公司“字母表”的研发支出分别为166、214、260和275亿美元。这还不算“动一根指头”吗?如果不算,什么才算呢?

亚马逊仅在2020年就花费了427亿美元用于研发,同时在全球雇用了超过100万名

员工。在美国,该公司雇用的员工比整个住宅建筑行业还要多:每 153 个就业的美国人中就有一个是亚马逊员工。如果这些人是懒惰的食利者,那他们就是奇怪的受虐狂:他们为什么不安于现状,解雇所有人,停止支出呢? 他们把这些研发资金花在了什么地方呢?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仔细分析谷歌、亚马逊和脸书的资产负债表就会发现,它们拥有的无形资产比其他大公司要少,事实上,今天它们拥有的无形资产比 10 到 15 年前要少得多。原因不难理解:所有这些数据都需要大量的物理网络和庞大的数据中心,但这种趋势给那些过分强调无形资产的论点造成了巨大的漏洞。

杜兰特肯定知道其中的一些数字。他能够摆脱这种分析困境的是“掠夺”概念,认为这些大规模投资为掠夺性力量而非生产性力量提供资金。事实上,有很多有趣的方法可以运用凡勃伦的分析框架来证明真正驱使资本家的不是逐利,而是进行破坏的能力,以确保今天的强盗大亨不仅能获得他们期望的利润,而且获得的利润要比竞争对手高。

在过去的 20 年里,一种被称为资本即权力(CasP)的新政治经济学方法应运而生,它引入了“级差积累”的概念来描述这种动态。该方法的追随者主要集中在加拿大的约克大学,他们批评马克思主义和新古典经济学忽视了这些“破坏”动态,忽略了权力在整个资本主义中的构成性作用。

在这里,把马克思和凡勃伦置于单一分析框架里的困难在于,马克思认为掠夺和破坏是封建主义的一部分,而不是资本主义的一部分。对凡勃伦来说,这些是所有资本家的本能,即使那些控制无形资产的资本家更有能力对其加以利用。然而,马克思最终认为资本家是有生产力的;如果提及破坏,那也只能是在整个资本主义的系统层面上,而不是在单个资本家的层面上。然而,这就需要阐明这些“掠夺性力量”到底是什么? 它们与积累以及所有关于“原始积累”的棘手的论战有什么关系? 否则,我们就不明白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何需要“掠夺”这一高度模糊的理论外衣,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的范畴如利润、资本主义生产以及租金和食利主义足以解释谷歌的成功。

马克思本人明确指出了这一事实,即完全自动化的资本主义企业不仅占有其他地方产生的剩余价值,而且它们是以利润而不是租金的形式占有剩余价值。这些自动化企业与直接剥削雇佣劳动的企业一样,都是资本主义企业。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所写的那样:

一个在本生产部门内完全不使用可变资本,因而完全不使用工人的资本家(事实上这是一个极端的假定),会像一个只使用可变资本,因而把全部资本都投到工资上面的资本家(又是一个极端的假定)一样地关心资本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并且会像后者一样地从无酬的剩余劳动获取他的利润。(马克思,2004:219)

技术封建主义理论并非源于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进步,而是源于它对数字经济明显

的无能为力,准确地说,其中究竟生产了什么以及如何生产。如果我们承认谷歌从事的是生产搜索结果商品的业务,那么将其视为一家从事正常资本主义生产的普通资本主义企业就没有什么困难。这并不是说数字巨头们没有采取其他各种策略来巩固自己的实力、利用自己的专利组合、锁定自己的用户并阻挠任何可能的竞争,除了砸重金赢得国会议员的支持外,他们还经常收购对其形成挑战的初创公司。资本主义竞争是一门肮脏的生意,当涉及数字产品时,它可能更加污秽不堪。如果想要了解单个企业的策略及其行为的系统性后果,我们可能需要凡勃伦和马克思;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者可以从“资本即权力”学派中学到很多东西。

7 国家入场

除了缺乏清晰的分析,技术封建主义框架的另一个主要问题是,它有可能将国家排除在外。杜兰德的《技术封建主义》很少讨论美国政府在“字母表”、脸书、亚马逊崛起中的推动作用;其他许多关于技术封建主义的短篇文章对此也是讨论甚少。杜兰特对他所称的“加利福尼亚意识形态”的批判,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网络空间大宪章》的网络自由主义取向。但他忽略了提及该文件的四位作者之一、著名投资人埃丝特·戴森(Esther Dyson),曾在美国最好的政权更迭机构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董事会任职多年。除了一些反面论述,其中包括琳达·韦斯(Linda Weiss)的名著《美国公司?安全国家中的创新与创业》(*America Inc. ? Innovation and Enterprise in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ate*, 2014),美国在硅谷崛起为全球技术经济霸主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被大大低估了。从技术封建主义的视角来解读这些发展,即技术封建主义假定国家是弱小的,主权被“分割”给众多技术霸主,只会进一步混淆视听。最近所有关于科技公司力量的技术热潮形成了根深蒂固的看法,即数字平台的崛起是以剥夺国家权力为代价的。

对于实力较弱的欧洲和拉美国家来说,情况可能就是如此,这些国家近年来几乎都是美国公司的殖民地。但美国本身也可以这样说吗?谷歌前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领导着五角大楼的咨询机构美国国防创新委员会,那么硅谷与华盛顿之间的长期联系怎么样呢?由蒂尔联合创办的帕兰提尔公司(Palantir)在美国的国家监视和美国科技之间提供了重要的纽带,那么帕兰提尔公司又怎么样呢?还有扎克伯格的论点,即地缘政治在技术封建主义的观点中几乎是隐形的。

这种对国家在美国科技产业整合中所扮演的角色缺乏关注的现象,会不会是布伦纳式资本主义分析框架导致的结果呢?这种框架试图通过观察其行动来推断它的“运动规律”。如果把冷战和反恐战争,包括军事开支、监视技术以及美国军事基地的全球网络排除在外,将其视为无关紧要的非资本主义因素,不重视“资本”想要什么和做什么,那么就不

可能理解美国科技产业的崛起。

从布伦纳的视角来看,国家对资本持续运作的任何系统性干预可能都被视为“政治资本主义”的例子,而不是由其自身运动规律驱动的正常运作的“经济”资本主义。对布伦纳本人来说,在全球制造业产能过剩的情况下,美国经济长期停滞不前,导致美国统治阶级中的权贵们放弃了对生产性投资的兴趣,转而通过政治手段进行财富向上再分配。(Brenner,2020:22)奇怪的是,左翼和右翼在这一点上似乎是一致的。毕竟,发现“政治资本主义”无处不在的腐蚀性影响是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典型特征,它们关注的是公职人员的寻租行为以及干预资本运作的个人主义网络的死灰复燃。正是这种对“政治”资本主义而非“经济”资本主义的关注,催生了“公共选择学派”(Public Choice)以及路易吉·津加莱斯(Luigi Zingales)等芝加哥经济学家对反腐败的盲目迷恋。

8 更广阔的海洋

目前,将剥削和征用纳入单一模式的唯一方法是,我们需要对资本主义本身有一个更宽泛的概念。南希·弗雷泽就是这样做的,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弗雷泽的观点仍在阐述之中,它是否能成功解释更广泛的地缘政治和军事因素还有待观察。但其论点的主旨似乎是正确的。在20世纪70年代,人们或许可以把非自由劳动、种族和性别统治、无法估价的能源使用,以及因核心国家从边缘国家攫取廉价商品而造成的不平等贸易条件,分析为由剥削驱动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外部因素。性别、气候、殖民主义、消费和奴隶制等方面的历史学家所做的一些出色的实证性研究越来越多地对这些观点提出了质疑。杰森·摩尔(Jason Moore)写道:“当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孤岛能够占有潜在廉价自然(Cheap Natures)的海洋时,资本主义就会兴旺繁荣。它在资本的环道之外,但对资本的运作至关重要。”(Moore,2018:237-279)当然,这不仅适用于廉价自然,还有许多其他活动和过程可以利用,因此,这些“海洋”比摩尔所说的范围更广。

政治马克思主义可能必须做出的一个重大让步是,放弃将资本主义视为一种以经济和政治功能分离为标志的制度,“经济需求提供了强迫工人将剩余劳动转移给资本家的直接动力”。我们当然有充分的理由指出,民主的进步止步于工厂大门;政治领域赋予的权利并不一定能消除经济领域的专制。当然,这种假定的分离在很大程度上是虚构的:正如伍德在她关于这个问题的开创性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样,是资产阶级经济理论将“经济”从其社会和政治内容中抽离出来,而资本主义本身则将诸如“控制生产和占有的权力,或社会劳动的分配”等本质上属于政治的问题从政治领域分离出来,并将其转移到经济领域。真正的社会主义解放需要充分认识到两者之间的分离是人为的(Wood,1981:66-67)

然而,如果“政治”对“经济”的构成如此重要,那么我们不禁要问,把资本主义视为一

种将“政治”和“经济”区分开来的制度会带来什么好处？资本家和他们的理论家这么说是另一回事，而这在多大程度上准确描述了资本主义的实际情况则是另一回事。这里让人想起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的一句调侃：现代性用分叉的舌头说话：它说科学和社会是两极分化的。但这种战略上的混淆恰恰使它能够如此有效地将它们杂糅在一起。资本主义政治与经济的故事可能与之非常相似。

回过头来看，不难理解为什么布伦纳从未被哈维创造的“剥夺式积累”所打动。因为这个概念指的是再分配而不是生产，所以它无法从“原始”升级为正常的资本主义积累，至少在布伦纳的理解中是如此。然而，鉴于过去40年来积累的所有历史证据，尤其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和新冠疫情期间，即使是布伦纳，也很难将再分配作为实际存在的资本主义之外的东西排除在外。他在2020年关于新冠肺炎疫情救助计划的文章《不断升级的掠夺》中写道：“在一个漫长的时代，我们所经历的是不断恶化的经济衰退与不断加剧的政治掠夺。”(Brenner, 2020: 22)“政治”一词在这篇文章中频繁出现。在布伦纳看来，政治暗示着资本主义积累的“正常”过程正在失效。

由于缺乏在资本主义积累的更广泛的解释中连接再分配和剥削的框架，布伦纳只剩下最后一步：假设资本家对国家驱动财富向上再分配的依赖正在使资本主义脱离自身，走向一种显然与封建主义有着共同核心特征的经济形式。这将保留原有模式的纯粹性，“资本主义”这一荣誉称号可以留给那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制度，在这种制度里，积累确实是通过创新而不是通过掠夺或剥夺实现的，但代价是引发各种次要分析和政治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杜兰特论点中的弱点是布伦纳—沃勒斯坦论战中悬而未决的矛盾的产物。

在这里，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可以在杜兰特视其为封建主义者和食利者的技术领域里找到“创新式积累”仍然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最好证据。当我们摒弃这些分析框架中过度确定的宏观叙事时，我们都能看到这一点，无论是哈维作为政治项目的“新自由主义”，还是韦尔切罗内的“认知资本主义”。

同时，马克思主义者最好承认，在整个历史中，剥夺和征用一直是积累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许，在资本主义核心地区只使用经济手段榨取价值的奢侈做法，往往是因为在非资本主义边缘地区广泛使用超经济手段榨取价值所致。一旦我们实现了这一分析上的飞跃，我们就不再需要费力地援引封建主义了。利用一切可以调动的资源——越便宜越好，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向一如既往。从这个意义上说，布罗代尔(Braudel)曾将资本主义描述为“无限适应性”，这并不是可以接受的最糟糕的观点。但它不会连续不断地调整，即使进行了调整，向上再分配的趋势也不一定会战胜生产性趋势。这很可能正是当今数字经济的运作方式。当然，这并不能成为我们认为技术资本主义比技术封建主义更美好、更舒适、更进步的理由。如果徒劳地援引后者，我们就有可能洗白前者的声誉。

参考文献:

- Bloch, Marc. 1939, 2014. *Feudal Society*[M]. London:Routledge.
- Brenner, Robert. 1977. The Origins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A Critique of Neo-Smithian Marxism[J]. *New Left Review*(104): 54-71.
- Brenner, Robert. 2006. What Is, and What Is Not, Imperialism? [J]. *Historical Materialism*(4): 79-105.
- Brenner, Robert. 2020. Escalating Plunder[J]. *New Left Review*(123): 22.
- Caffentzis, George. 2012. *In Letters of Blood and Fire: Work, Machines, and the Crisis of Capitalism*[M]. Oakland:PM Press.
- Christophers, Brett. 2020. *Rentier Capitalism: Who Owns the Economy, and Who Pays for It?* [M]. London:Verso.
- Drahos, Peter. 1995. Information Feudalism 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J]. *The Information Society*(3):209-222.
- Drahos, Peter & John Braithwaite. 2002. *Information Feudalism: Who Owns the Knowledge Economy?* [M]. Abingdon:The New Press.
- Durand, Cédric. 2020. *Techno-féodalisme: Critique de l'économie numérique*[M]. Paris:ZONES.
- Foley, Duncan. 2013. Rethinking Financial Capitalism and the “Information” Economy [J].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3):257-268.
- Gago, Verónica & Sandro Mezzadra. 2017. A Critique of the Extractive Operations of Capital: Toward an Expanded Concept of Extractivism[J]. *Rethinking Marxism*(4): 574-591.
- Harvey, David. 2014. *Seventeen Contradictions and the End of Capitalism*[M]. New York:Profile Books Ltd.
- Kobrin, Stephen. 1998. Back to the Future: Neomedievalism and the Postmodern Digital World Economy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2):361-386.
- Lucas, Rob. 2020. The Surveillance Business[J]. *New Left Review*(121):149-160.
- Marx, Karl. 1990. *Capital, Volume One*[M]. trans. Ben Fowkes. London: Vintage,915.
- Moore, Jason. 2018. The Capitalocene Part II: Accumulation by Appropriation and the Centrality of Unpaid Work/Energy[J]. *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2): 237-279.
- Orhangazi, Özgür. 2019. The Role of Intangible Assets in Explaining the Investment-Profit Puzzle[J].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5): 1251-1286.
- Posner, Eric & Glen Weyl. 2018. *Radical Markets: Uprooting Capitalism and Democracy for a Just Society*[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Rikap, Cecilia. 2021. *Capitalism, Power and Innovation: Intellectual Monopoly Capitalism Uncovered*[M]. London:Routledge.
- Schwartz, Herman Mark. 2021. Global Secular Stagnation and the Ris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Monopoly [J].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1): 1-26.
- Supiot, Alain. 2013. The Public-Private Relation in the Context of Today's Refeudalization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stitutional Law*(1): 129-145.
- Supiot, Alain. 2015. *Governance by Numbers*[M]. London: Hart Publishing.
- Wallerstein, Immanuel. 1974. *The Origins of the Modern World-System*[M].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Wickham, Chris. 2021. How Did the Feudal Economy Work? The Economic Logic of Medieval Societies[J]. *Past & Present*(1): 3-40.
- Wood, Ellen Meiksins. 1981. The Separation of the Economic and the Political in Capitalism[J]. *New Left Review*(127): 66-67, 80.
- Zuboff, Shoshana. 2019. *The Age of Surveillance Capitalism: The Fight for a Human Future at the New Frontier of Power*[M].

New York:Public Affairs.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200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2004. 资本论;第3卷[M]. 卡尔·马克思. 北京:人民出版社.

The Critique of Techno-Feudal Reason

Evgeny MOROZOV trans. by JIANG Lin

Abstract: Countering current claims that digital capitalism is issuing in a “neo-feudal” age, as the rentier barons of Silicon Valley and Wall Street are extracting non-productive fortunes from their users and debtors, the author of this article delves into the landmark Brenner Debate, starting from feudalist logics and Habermas’ s concept of “refeudalization”, analyzes the capitalist essence of exploitation, appropriation and dispossession at the stage of primitive accumulation, and points out that unlike the “accumulation via innovation” caused by the systemic pressures exerted on capitalists, David Harvey’ s concept of “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 has become the dominant form of accumulation in the new era. The article argues that modern finance is overtaken by the logic of dispossession and the logic of parasitism, and by establishing control over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intangibles—including data holdings, today’ s capitalists have become rentiers, entirely parasitic on the creativity of the masses without ever being directly involved in the productive process. The rise of data has given birth to a massive digital economy, and the digital giants such as Google and Facebook manage to appropriate huge chunks of the global mass of surplus value through the user-data-advertising connection. In addition, the article questions Shoshana Zuboff’ s “surveillance capitalism”, stating that it has no radical political agenda and cannot grasp just how the non-capitalist digital economy might operate in the future. It also criticizes the practice of techno-feudalism that excluded the state out of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and understated the important role played by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rise of Silicon Valley as a global techno-economic hegemon.

Key words: digital Capitalism; Neo-Feudalism; digital economy; technology firms

责任编辑:陈宁